

钢铁业将为碳达峰贡献什么

陈发明

深度观察

近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9月份，中钢协会会员钢铁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93亿元，同比增长1.23倍。9月份，全国粗钢日产水平降至近三年来最低值，产量压减政策见效。

减量提质，成为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最鲜明的特征，也是钢铁行业推进碳达峰的必由之路。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占全球钢铁碳排放总量的60%以上，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左右，是全国制造业门类中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因此，钢铁行业的低碳发展对工业领域乃至全国碳达峰具有重要影响。从行业发展本身看，钢铁行业的碳达峰，要从优化产能结构、能源结构和工艺技术等方面实现。

首先，钢铁产能和产量的达峰，是钢铁行业碳达峰的基础因素，也是关键因素。今年初以来，国家在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强能源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制定全年粗钢产量不高于去年的目标以及限制钢材大量出口的政策。随着政策效应显现，今年前8个月，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比重有所下降。回

钢铁行业的低碳发展对工业领域乃至全国碳达峰具有重要影响。从行业发展本身看，钢铁行业的碳达峰，要从优化产能结构、能源结构和工艺技术等方面实现。这对钢铁行业来说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个紧迫的任务，但只要走得实、做得实，就一定能看到美好的未来。

看过去几年和展望未来，钢铁产能产量“双控”是整个行业运行的基调。随着严格执行产能置换、严禁新增产能、推进存量优化、淘汰落后产能等政策的落地见效，“产达峰”将是钢铁行业碳达峰的基础。

其次，钢铁生产的资源变革、工艺变革，是钢铁行业碳达峰的活力因素，也是潜力因素。目前，我国钢铁领域高炉、转炉长流程工艺结构仍占主导地位，平均吨钢碳排放量达2吨左右；与之相比，电炉短流程工艺吨钢碳排放量明显较少。两种不同流程工艺结构不同，所需资源也不同，前者以铁矿石为主，后者以废钢为主。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炼钢工艺流程变革的重要因素就是废钢资源不足。根据工业发展规律，我国钢铁

蓄积量将持续增加，这意味着废钢资源量也将日渐充足。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促进钢铁行业结构优化和清洁能源替代，大力推进非高炉炼铁技术示范，提升废钢资源回收利用水平，推行全废钢电炉工艺。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专家分析认为，2020年，我国炼钢废钢比就达到了21%，而今年1月至8月炼钢废钢比更是达到了23.1%。虽然与过去纵向比较有了很大提升，但横向相较于国际水平依然相差甚远。随着全社会钢铁蓄积量向“碳达峰”的积累，未来我国废钢利用仍有很大潜力空间，由此带来钢铁生产流程结构的变革，不仅会降低对铁矿石资源的依赖，

也将成为钢铁行业推进碳达峰的重要着力点。

再次，钢铁企业的能源优化、技术优化，是钢铁行业碳达峰的现实需要，也是必然要求。在钢铁生产流程结构发生质的变革之前，通过推广先进适用技术进行降碳，是目前钢铁企业普遍采用的路径。除了对常规炼钢工艺装备进行清洁化改造外，近年来，钢化联产、氢冶金、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已在钢铁行业进行了探索。随着相关鼓励政策的出台，这些降碳新技术将会有更多的实践积累和推广。此外，从能源角度看，短流程结构在钢铁生产占比的提升，将有效降低煤炭的使用量。同时，在绿色能源加快推广的大背景下，钢铁行业的用能结构也将更绿、更优。

推进碳达峰，“碳大户”要有大作为，作出大贡献。据了解，钢铁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划和政策文件正在制定中，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也提出在2030年前，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碳达峰的工作目标。从降碳实践到低碳发展，再到深度脱碳，对钢铁行业来说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个紧迫的任务，但只要走得实、做得实，就一定能看到美好的未来。

压缩粗钢产量旨在高质量发展

胡麒麟

中钢协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粗钢日产环比下降8.45%，同比下降21.2%，这是粗钢日产近三年最低值。至此，压缩粗钢产量的工作终于初见成效。

2020年，我国粗钢产量突破10亿吨大关，同比增长5.2%，占全球粗钢产量的比重在56%左右。不过，粗钢产量屡创新高并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应有的特征。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我国钢铁产业日益凸显的资源保障、节能降碳、产品结构等问题必须面对和解决。

中国钢铁产业并非在刻意追求粗钢产量。我们巨大的产能，是在下游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原材料需求拉动下逐步形成的，它与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以及融入全球市场的进程相匹配。当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钢铁产业满足国民经济运行需求的总量问题已经转化为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结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多资源和精力来进行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升级产品结构，实现绿色高端制造材料的转型升级。

在“双碳”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资源

环境约束比以往更强。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一方面各国在消费我国物美价廉的钢铁产品，另一方面我国却独自承担大宗原料的环境成本溢价，以及日趋高昂的碳成本。在我国钢铁产业和下游制造业满足全球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全球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并没有留在国内，而是通过高价的进口原料价格和低廉的产品价格转移到了资源出口国和碳排放的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进行总量控制，未来我国钢铁产业和下游制造业将承担与自身利润水平不匹配的碳成本，这不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

之所以能够将粗钢产量控制住，一是因为有关方面坚定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和能源、排放的刚性约束推动钢铁产业降碳，进而倒逼钢铁生产企业压缩产量。二是加大钢铁生产企业整合力度，不断提升行业集中度，通过股权纽带来实现同一企业集团内的资源协同，降低粗钢产量压缩的阻力。三是对钢铁产业需求结构进行了调节，尤其是对外需进行了管理，通过钢铁初级加工品出口关税的调整减少了不合理的外需，让国内钢铁产量优先满足国内

市场需求，这种需求的变化传递到供给端，对粗钢产量的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粗钢产量的控制，一方面缓解了今年以来进口铁矿石等上游原料的供需矛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料价格上涨的市场预期，打压了投机力量的炒作空间；另一方面，钢铁生产企业虽然产量减少，但由于市场需求依然旺盛，企业盈利水平可以在原材料成本下降的过程中得到改善。从实践来看，减产并未减效，钢铁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月至9月，中国钢材价格指数平均值同比上升39.85%，中钢协会会员钢铁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2.52%，营业成本增幅低于收入增幅2.87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23倍。

所以说，尽管实施粗钢限产，钢铁生产企业依然有充足资源投入到高附加值产品和节能降碳技术的研发中，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压缩粗钢产量有利于提升行业高质量发展能力。下一阶段，钢铁行业应按照国家政策要求，不断提升国内钢铁产品供需动态适配性，加强技术创新，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展。

（作者系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11月4日，江西省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卷板厂，工人正忙着吊运钢卷供应海内外市场。江西新余钢铁集团以三极新钢、数智新钢、绿色新钢等战略，加速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步伐，冷热卷、电工钢等高端钢铁精品全面实现产销两旺，今年1月至9月营业收入达886亿元。赵春亮摄（中经视觉）

头条热评

劳务关系转包先要“包”责任

魏永刚

骑手是快递服务行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一群以勤奋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劳动者。百万骑手维权难，折射出的是劳动权益保障的困境。破解这道难题，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努力，但首先是用工企业要把责任担起来。

劳务派遣和劳务关系的转包，是劳动关系发展的一种制度性创新。这种方式在降低人力成本、提高企业效益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这种制度本身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发展，也方便了就业。但是，百万骑手劳动维权困难，从一个角度说明有些企业确

实以劳务转包的形式，把自己该负的责任“包”出去，甚至“包”没了。

人是劳动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宝贵的资源。劳动关系转包应该有利于人力资源发挥作用，而不能是对从业者劳动权利的“推卸”。劳务关系转包，首先要“包”责任“包”下来。这是转包和承包企业双方都应该负起的责任。劳务企业和劳动派遣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劳动者的责任。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劳务派遣制度的基本内容。无论如何转包，劳动者权利只能是“包”得越来越好，而不能“包”没了。

美联储“等待”策略有用吗

徐晋

当地时间11月3日，随着美联储宣布启动缩减购债计划（Taper），资本市场似乎可以喘一口气了：年度最大不确定的“靴子”终于落地，最终结果也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不过，美联储在解决美国通胀和经济增长难题上依然面临许多困难，尚无良方。

美联储当天宣布的内容看点有二：一是11月份开始缩债，保持联邦基准利率不变；二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试图把缩减购债和加息问题切割开来，显示出对市场的呵护之意。从市场反应来看，美国三大股

指悉数收涨，可见市场前期已经将此消息消化得差不多了。

值得警惕的是，美联储一方面对美国经济形势保持非常乐观的预判，另一方面面对疫情反复、供应链中断、通胀高企等棘手难题，并无实实在在的应对之策或建议，只是重申“保持耐心”这一立场，耐心等待疫情消退，等待通胀自行回落，等待工人回到岗位。但这真的靠谱吗？想想仍在攀升的美国确诊病例、港口外堵的集装箱船、不断上涨的物价，等待是否能带来“风平浪静”？

客观看待宏观杠杆率变化

娄飞鹏

经济增速变化是我国宏观杠杆率变化的主因。2020年，我国经济受疫情影响，GDP增速远低于潜在增速是推升宏观杠杆率的主因。无论从横向国际形势还是纵向时间维度来看，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规模并不算最高。下一步，需要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依靠经济持续增长合理调控宏观杠杆率。

近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我国宏观杠杆率已连续四个季度下降，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连续五个季度下降，政府部门杠杆率较年初略微下降，居民部门杠杆率基本稳定。2020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变化转折明显。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名义GDP增速放缓、宏观对冲力度加大，导致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而从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经济持续恢复，宏观政策保持连续稳定，推动宏观杠杆率下降。

在宏观杠杆率总体下降的同时，各部门内部杠杆率结构变化也有向好态势，在居民部门表现尤为明显。2021年前三季度，居民部门加杠杆主要是由于个人经营性贷款增加，房地产贷款等居民中长期贷款呈下降态势。其原因在于，为有效落实“房住不炒”，即便是疫情期间住房贷款利率总体仍保持稳定，严厉打击个人经营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有效抑制了投机购房。与此同时，为应对疫情的影响，从量和价两方面发力，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

不过，经济增速，即扩大“分母”，在推动宏观杠杆率下降方面的持续性值得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基数因素，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规模并非最高，本身不利于宏观杠杆率持续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在于推动因素，除了宏观政策保持连续稳定外，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持续恢复增长，但与此同时，持续恢复存在不稳固、不均衡

问题，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

从横向国际形势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规模并不算最高。从横向比较看，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主要经济体利用宏观调控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功能，纷纷推出空前的宽松宏观调控政策，利用货币超发，推动杠杆率短期内快速上升。这种情况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也出现过。但相比2009年，全球宏观杠杆率上升规模更高，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就国际比较而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宏观杠杆率上升规模均远高于我国。

从纵向变化看，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规模低于2009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为应对危机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财政政策积极扩大支出，货币政策宽松多次降准降息，杠杆率短期内快速提高。面对宏观杠杆率快速提升，2016年以来我国着力推进去杠杆、稳杠杆，宏观杠杆率快速上涨势头得到较好遏制。2020年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货币政策在保持必要支持力度的同时并没有大水漫灌，宏观杠杆率远低于2009年。

从推动因素看，经济增速变化是我国宏观杠杆率变化的主因。2020年，我国经济受疫情

影响，GDP增速远低于潜在增速是推升宏观杠杆率的主因。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出现负增长，整个上半年GDP负增长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提高。此后随着疫情在我国逐步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恢复，宏观杠杆率增速下降。2021年以来，我国经济延续恢复态势，虽然前三季度当季GDP同比逐季下降，但各季度环比均为正增长，累计同比增速仍然较高，推动杠杆率下降。

目前来看，需要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依靠经济持续增长合理调控宏观杠杆率。疫情发生以来，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但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价格成为维持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非金融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投资需求有待提振。2021年初以来，居民消费增速超过可支配收入增速，并从第三季度开始消费支出恢复力度减弱。这些因素不利于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另外，疫情形势下仍不稳定，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运动式”“一刀切式”减碳，正在得到纠正。

对此，在有效做好疫情防控，科学准确理解并有效贯彻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同时，需要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要手段，产业、投资、就业等政策紧密配合，进一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从而稳定宏观杠杆率。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